

# 唐代长安与北宋东京城市建设比较研究

于梦佳

(渤海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唐长安城和北宋东京城作为我国古都的重要代表,在城市建设方面也堪称古代城市建设的典范之作,二者在城市建制和布局方面,体现着我国古代历史上城市发展的脉络趋势,完成了由里坊到街巷的转变,对后世的城市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对现今的一些规划也有着指导意义。

**关键词:**长安城;东京城;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 TU 984. 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3-0064-06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rban Construction between Chang'an City of Tang Dynasty and Dongjin City of North Song Dynasty

YU Meng-jia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Being the very important represents of China's ancient capitals, Chang'an City of Tang Dynasty and Dongjin City of North Song Dynasty are referred to as models of urban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In terms of the urban system and the city layout, both cities displayed the tendency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cities with the pattern transformation from Lifangzhi to Jiexian-gzhi, which provides not only the great influence to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ter but also a significant guidance to the urban plan today.

**Key words:** Chang'an City; Dongjin City; urban construction

唐代长安城和北宋东京城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唐宋这一历史转型时期,城市也开始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本文就两城在城市建设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并深入探讨在城市布局和规划方面对现今的借鉴意义。

### 一、两都建都背景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582年),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开始营建大兴城,由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仅耗时一年,便完成了宫城和皇城的建设。

收稿日期:2013-02-28

作者简介:于梦佳(1989-),女,陕西西安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迁至新都,隋炀帝继位后,开凿运河连接大兴和扬州。大业九年(613年)，“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sup>[1]84</sup>在皇城和宫城外修筑外郭城,城市的总体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建唐,大兴易名为长安,长安城作为唐朝首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开始进一步的修建,高宗时在龙首塬修建了大明宫,玄宗时期兴建兴庆宫,自安史之乱后长安城逐渐衰败,唐末黄巢之乱时,黄巢攻破长安,长安城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天佑元年(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后下令迁都洛阳,宫室遭到拆毁,随后还下令将所拆下的屋木通过河流运送至洛阳,然后将长安城焚毁,长安城中的人民被迫迁移。此后长安便告别了帝都时代,从五代时期开始,政治中心进而转移到东京。

东京位于春秋时魏都大梁的附近,原称汴州。隋朝时期大运河的修建使得位于汴河与黄河的交会处的开封成为沟通关中、中原和江淮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成为漕运的重要转运中心之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永平节度使李勉扩建汴州城,规模宏大,坚固宽广,是后来东京城的雏形。五代时,梁、晋、汉、周均在此建都。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对城市建设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规划,扩大城池,拓宽道路,疏通河道。城市面积因此扩大了四倍。并建设了外城,形成皇城、里城、外城的三套市的基本格局。北宋统一后在此基础之上扩建,其城市不单在规模上有所扩大,更在诸如城市绿化,街道景观等更细节处有了创新式发展。东京的繁华程度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有直观的表现。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东京,城市遭到毁坏,而后都城南迁临安。昔日繁华的东京城而后由于黄河决口使得城市备受水灾之祸,逐渐衰败。

唐长安城和北宋开封城在定都时也不乏异议,但最终得以定为都城均有各自得天独厚的条件,两城作为我国古代社会都城建设的主要代表,在定都的原因上却不尽相同。

长安建都于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其地处黄河上游,四面环山,有四塞之固。不单如此,长安所处之地四周关隘林立。东有函谷关、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这也便

是此地得名“关中”的原因。除了军事方面的易守难攻,关中地区地处渭河平原,土壤疏松肥沃,水利建设比较完善,农业生产十分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天府”的美誉。并且,长安城附近有泾、渭、灞、浐、灃、沣、滈、涝八条河流,在灌溉和水利交通上也极为便利,但是尽管长安城有着这样及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但也并非完美,长安较于全国而言,地处西北,尽管关中内部交通四通八达,但若与外界沟通起来,却并非十分便利。

北宋定都东京城是由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决定的,周宝珠在其《宋代东京研究》中分析:“唐自安史之乱起,汴州依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日益显露出其重要性”<sup>[2]6</sup>。自唐中期以来,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的经济水平已经赶超过了北方黄河流域,在历经五代的发展,到北宋时期,北方的物资已经多需南方供应,因而,水运交通变得极其重要。自隋朝修大运河后,开封城位于汴河与黄河的交会处,是漕运的重要转运中心,自此开封城的水路交通的优势得到充分显现。“汴河漕运量为每年600万石,从江南运到开封则可,而运到洛阳、长安则难”<sup>[2]19</sup>。由此可见,开封城便利的水运交通,解决了粮食供给这一重大问题。再者,北宋王朝是宋太祖赵匡胤以周旧部取代天下,朝中大多来自后周,在开封早已安家,自是不愿有迁都之举。以开封为都,也颇是顺应民意之举。但也不得不提,开封为都也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漕运作为重中之重,定然注意维护,但必会造成开销过大,劳民伤财。而宋太祖所言“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sup>[3]2137</sup>,则是考虑到开封自古地域开阔,四周无大山大河为险,易攻难守,因而需要重兵把守,这自然造成了冗兵,消耗民力财力,因而宋太祖才感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sup>[3]2137</sup>可见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上建都开封并不理想。

## 二、都城的规模布局

隋唐时期长安城整体平面布局(图1)方正规整,采用中轴对称式的棋盘布局,总面积达83.1平方公里,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城市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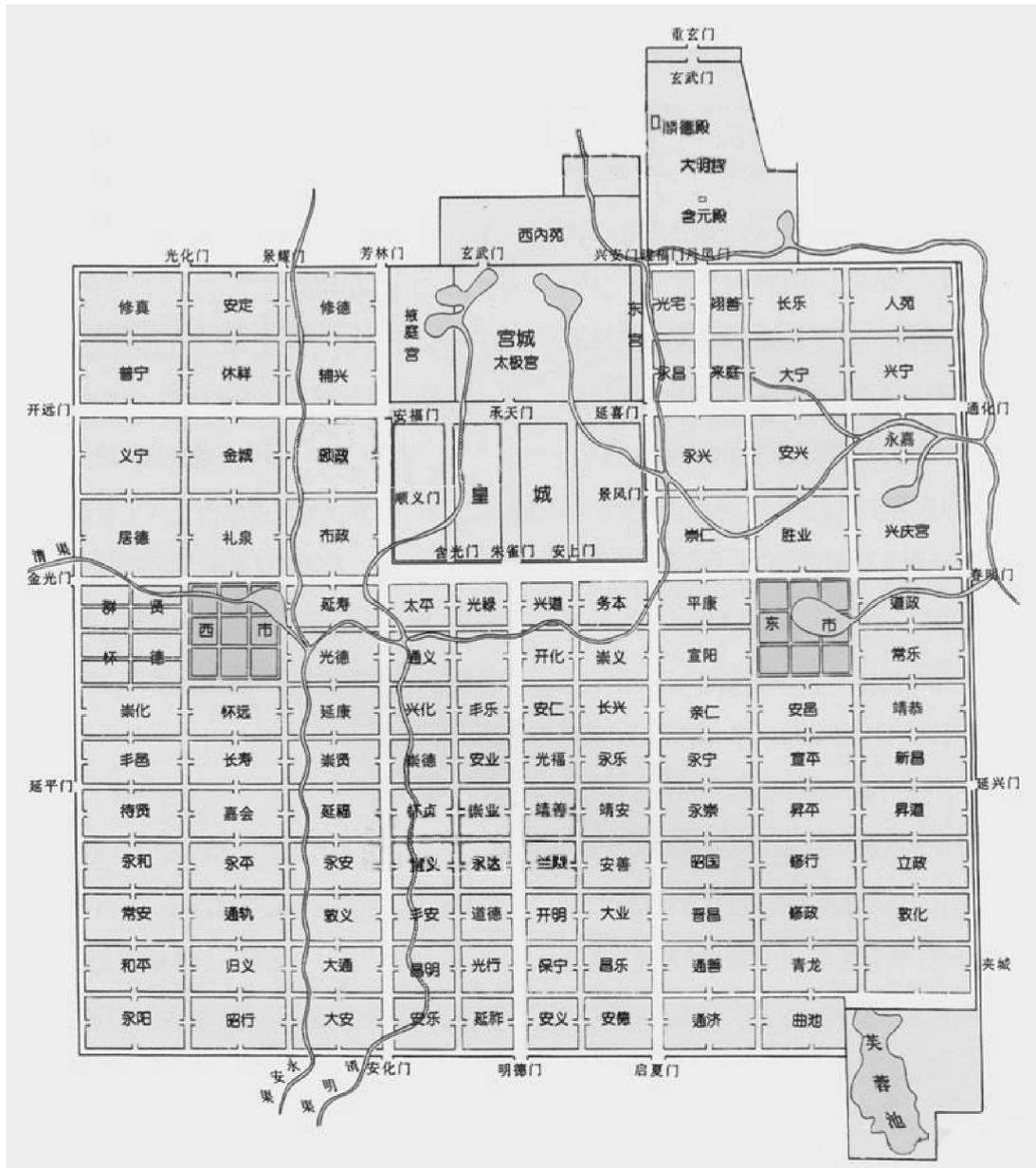


图1 隋唐时期长安城整体平面布局

呈长方形,东西长 9 721 米,南北宽 8 651.7 米,四周总长 36.7 公里。城市布局上采用严格的里坊制,并且体现了“官民不相参”的思想。

外郭城,共十二座城门,每面各三座城门。体现了周礼的“王都九达”的思想。东面正门为春明门,南侧为延兴门,北侧为通化门;西面正门为金光门,南侧为延平门,北侧为开远门;南面正门为明德门,东侧为启夏门,西侧为安化门;北面的中段与宫城北墙,东段与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中为景耀门,东侧为芳林门西侧为光化门。其中正门明德门为唐长安城外郭城最大的城门,有

五个门道,余下诸门均为三个门道。门外大道向南八十里直达终南山,门内北有朱雀门大街和承天门大街向北与皇城正门朱雀门与太极宫正门承天门直对。依据考古测量显示,明德门东西长 55.5 米,南北长 17.5 米,门道宽 5 米,唐高宗永徽五年十一月工部尚书阎立德领工营建了城门楼,唐末于战乱中被焚毁。

宫城在布局上也呈长方形,整体居于郭城北部正中处,四周以高墙围筑,周长 8.6 公里,其中东西长 2 820 米,南北宽 1 492 米,宫城分为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三部分,太极宫(隋称大兴宫)即

“大内”居正位,其东为东宫,乃太子所居之处,其西为掖庭宫后宫人员所居之处。宫墙南面正中为承天门(隋称广阳门),东侧为延喜门,西侧安福门,北宫墙中部为玄武门。

皇城规制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南部,周长 9.2 公里,南北宽 1 843 米,东西与宫城等长。皇城北面与宫城以横街相分隔,其余三面开五门:皇城南面,中为朱雀门,其东西两侧分别为安上门和含光门;皇城东西面各开一门,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朱雀门为正门开于南面正处,北对宫城的承天门,向南城外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的明德门,此南北一线构成了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长安城内里坊与市的分布情况以几乎此道互为对称,十分规范。

宋代东京城整体布局(图 2)较为不规整,但大体上略呈正方形,和隋唐长安城一样也是三套城墙,由外向内依次是外城、里城、宫城。

外城即为罗城,筑于周世宗时期,作为东京城的主要防御屏障,宋朝历代皇帝都对外城的修治相当重视,神宗时因都城久未整修而对外城进行大规模的修整扩建,使城周由原来的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扩为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不仅扩大了外城范围,加强了城门的防御功效。后又“又买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封筑团敌马面”<sup>[4]7327</sup>,以加强外城的军事防御。外城共开十二座城门,除北面为四门外,其余三面各开三门。外城门多有俗称,以其与周边城市的交通联系为名,如出曹门可达曹州(今山东菏泽南),宋门可抵宋州(今河南商丘县),郑门可通郑州(今河南郑州市),陈州门通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陈桥门通陈桥镇(今河南封丘县陈桥),封丘门通封丘(今河南封丘县),酸枣门通旧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县),卫州门通卫州(今河南汲县)。

里城,即阙城,旧时为唐代汴州城,唐德宗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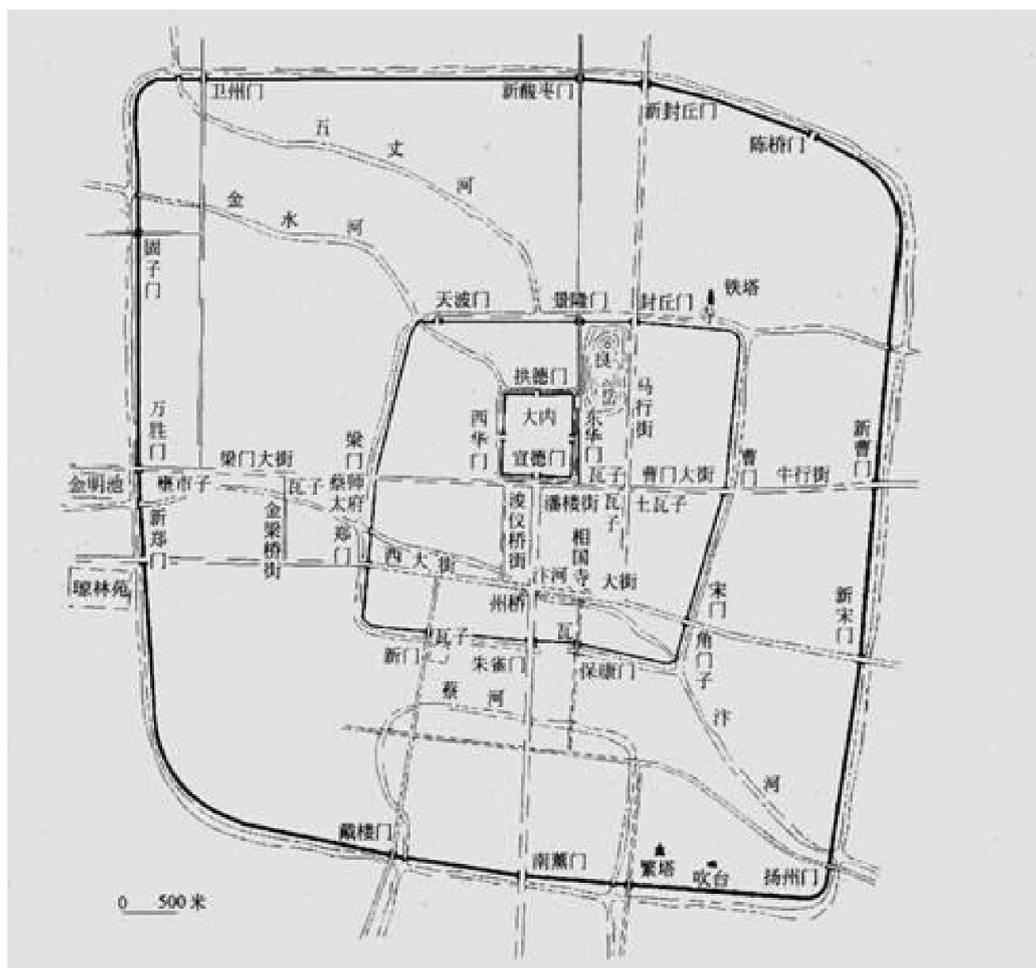


图 2 宋代东京城整体布局

中二年(781年)时任节度使李勉所修筑,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北宋建立后,屡加增修。共开十座城门,南北各开三门,东西各开两门。城外有为汴州城时期开凿的城壕,北宋时期为进一步加强军事防御,对其仍有保留,真宗时期,外城的城壕可与里城城壕以广济河相通。

宫城,作为北宋皇城周长五里,原是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后梁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sup>[5]2097</sup>,宫城共开六门,南面开三门,其余三面各一门,南面正门宣德门为宫门正门,也是城市中轴线的起始。而宫城墙在真宗时期由原本与外城、里城同样的土夯改为砖砌。

### 三、从里坊制到街巷制的城市面貌

里坊制由西周时期里制演变而来,将城市由街道划分开来,形成住宅区和商业区彼此独立,并且筑以高墙,设置里门与市门,有专职官员负责看守,并严格实行宵禁。

西汉时期,长安城划分为160里。里坊制度此时已初具规模,而发展到隋唐之时,里坊制度俨然区域完备达到鼎盛,长安城内的规制是由外郭城中的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交叉分割而成,具体数值为多少,至今纷论不休,分别有110坊、108坊、109坊各种论证,白居易有诗词描述当时长安城的里坊面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十分形象<sup>[6]5041</sup>。

里坊作为唐长安城内单独的居住单元,与今天住宅小区划分颇为类似,它有着严格的规制,外围有着高大的围墙环绕,十分有序。但恰恰是这层坊墙在易于城市管理的同时,给市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商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不便。入夜而闭,直至五更开启的夜禁制度虽然起到防范以及强化管理的目的,但弊端也显而易见。

进入到唐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开始在长安城内的坊内出现“侵街”,即在坊内开始出现开店,设置夜市这种有悖里坊制的行

为。不单如此,夜禁也开始遭到破坏,未及敲响门先开,或是直至深夜门未闭的情况屡有发生。

而宋代东京城里坊制度早在隋唐之时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萌芽,随着漕运的发展,汴州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的商业十分繁荣,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桥市通宵酒客行”这般通宵夜市的情况<sup>[6]3406</sup>。到了五代后周时期,周世宗下诏“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sup>[7]167</sup>,这于唐长安城时严格的里坊规制是不可想象。

北宋初期,统治者意图重塑里坊制,在东京城内开始试图恢复长安、洛阳的建置。但是,当时“侵街”行为已然势不可挡,侵街建筑已然存在使得坊制空有其名未有其实。北宋初期所谓的恢复的里坊不过是厢一级一下的行政组织。而管理里坊的官员坊正一职的职能在唐朝时期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课役”<sup>[8]63</sup>,而到宋朝时期则变为掌管,到了宋神宗时期坊正一职已被废除,宋徽宗年间,政府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标志着“侵街”得到政府许可,承袭千年的里坊制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崩溃。

随着里坊制的逐步崩溃,城市的建筑面貌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隋唐长安城建城时期对城市的居住区域进行了统筹规划,然后逐步开始对城内进行填满,城市建制十分规整,街道宽阔,城市人口密度不高;而宋代东京城规建属于逐步向外扩张的形式,城市本身面积较长安而言便小,人口却多于长安,因而街道面积普遍比较窄小,人口密度也颇高。对于商业区的规划,隋唐时期长安城设有东市和西市,地处东西城坊的中心处,市内街道呈井字形,不若坊内宽阔,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市内交易活动;宋代东京城已出现繁华街市,楼阁也开始普遍出现,“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sup>[9]66</sup>。临街店铺林立,酒店邸店随处可见,民居也开始筑起高阁,或为商铺,或为民宅使用。这般繁华的街市场景在我国以往朝代是难以想象的。

#### 四、两都建设特点比较及对后世城市建设影响

唐长安城在建成之前,在城市构造,居民区、商业区、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都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市规模庞大,道路宽广更是空前绝后,这无疑唐长安城最大的特点,体现着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的恢弘气势和豪放的气质。在城市内部建筑上有着多样性和包容性,遍布坊内的各类宗教建筑便是最直观的体现,而市坊的严格分离,坊门的定时开闭,也带着明显秩序性。这也使得长安城成为我国古代封闭型城市建设的典型代表。

北宋东京城在规模不比长安城,道路较唐长安城在数量和宽度上也有所缩减,但较之而言,更添实用性。在布局上不像长安城因有规划在前,因而呈现出非规则性,在城市逐步扩展的过程中比较无序,东京城内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中轴线,因而发展也并不对称。而里坊的打破,市肆的临街而立,体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所以,在整个城市道路方面有别于唐长安城的气派,更具市井气息。这种开放型的街道也是北宋东京城最为显著的特点,以开放灵活的街巷制取代了封闭的里坊制这一巨大发展,使得东京城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从城市结构角度上说迈向近代化城市的一个开端。

唐长安城和北宋东京城作为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典型代表,对于后世乃至今天的城市建设

都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唐长安城在设计方面,考虑到了城市与自然、山水环境的和谐。白居易有诗云“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sup>[6]</sup><sup>4738</sup>,精选的树木整齐划一分列栽种于街道两旁,反映了城市良好的绿化情况。唐玄宗时引泾水注入曲江,在长安城东南隅对曲江进行大规模扩建,曲江园林的开发不仅对于调节城市气候等地理因素方面有着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曲江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园林,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在增添了各类文化节庆活动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文化,充分体现当时社会和谐安宁的状态。

从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发展和布局可以看出,城市的建设多以城市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抛开过去中轴模式,整个城市的布局整体偏于东南,这归因于东南部为城市的主要的商业活动地之一,由此可见,城市的主要消费区对于城市布局的影响情况。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入选入画的保康门地域也是城市的布局重心之一,此处为蔡河和汴河流经地域,是东京城的水运码头区,后世中以水运码头为中心而作为发展的情况可以从窥见端倪。

唐长安城与北宋东京城作为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典范之作,在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从长安城到东京城,是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由固定到灵活转变。标志着我国古代都市建设从以长安城为典型的最完备的里坊制城市到以东京城为代表的开放型的消费城市的转变,我国的近代城市得以发端。

#### 参 考 文 献

-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 [3]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4]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7]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M].邓广成,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